

转译、重组与维系:ANT 视角下的纸质相册与家庭关系

刘艺璇,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对20个家庭做深度访谈,探讨数字时代纸质家庭相册的存在意义。研究发现,纸质相册作为行动者实现了对家庭关系的转译:通过家庭成员的共同许诺增设对于“家”的责任关系,通过对记忆的具象显影强化不同成员间的情感联结,通过描摹理想家庭图景为成员暗示行为规范;在行动过程中,纸质相册征召众多异质行动者并成为“必经之点”,而后将行动关系铭刻于物质形态,最终构成了纸质相册的行动性来源,使得家庭关系的重组与维系成为可能。

关键词:纸质家庭相册;ANT;行动者;转译;家庭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5)01-0001-10

一、提出问题:数字时代纸质相册为何依然存在

改革开放初期,家庭相册曾风靡一时。当时的中国摄影迅速跨过照相馆摄影时期,相继进入手持相机时期与数码摄影时期。^[1]技术门槛和经济成本的降低使得家庭相册的中产阶级趣味迅速淡去,转而成为普通人的记忆载体。那时的家家户户都拥有至少一本纸质相册,用来收录家庭成员的各类照片,画面精良且装裱精美。数字时代到来之后,手机摄影推动了电子照片的普及,人们更习惯在手机相册中编辑和整理照片,或者以音乐相册和动态视频的形式分享照片,这使得纸质家庭相册的使用率大幅下降,大多数家庭的纸质相册都被束之高阁,不再更新。^①但浏览各种社交平台,仍然有不少人分享制作纸质家庭相册的感悟,还有更多人评论和留言,询问制作相册的各种细节。在他们的表述中,纸质相册是家庭生活的珍贵记录,也是凝聚家庭情感、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纽带。这些迹象与纸质相册的衰落形成奇异反差:面对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全面革新,电子相册明显更加方便,为什么这些人却更希望拥有纸质家庭相册?纸质相册对于一个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尚未出现电子照片的时代,纸质家庭相册被学者们视为家庭观念的有形表现,与家庭历史和家庭意识形态等诸多议题相互关联。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对家庭相册有一个生动的隐喻:“供家庭成员定期瞻仰的整洁的墓碑”^{[2]31}。“墓碑”彰显了布迪厄对于家庭相册的重要观察:用以追忆家庭历史的纪念性载体,可以从个体及更大的社会尺度描绘家庭历史。^{[2]31}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则观察到,每个家庭都通过照片构建了自己的肖像编年史,这样的一套便携式图像见证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3]不过作为对传统、文化、社区和国家的集合性叙事,家庭相册同时也是一种维持“梦想型家庭群体”的工具,^[4]在家族史方面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力量,^[5]部分西方批判学者也因此将家庭相册视为承载传统家庭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6]。然而数字技术出现后,纸质家庭相册被视为前数字时代的遗留产

收稿日期:2024-09-11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科研项目“卓越培育计划”(2023GYB02)

作者简介:刘艺璇(2000—),女,山西神池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胡翼青(1975—),男,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

① 为避免语义重复,下文所提到的“纸质相册”与“电子相册”均为家庭相册,分别指代纸质家庭相册与电子家庭相册。

物,上述与之相关的传统议题逐渐沉寂,西方为数不多有关家庭相册的研究都聚焦于记忆领域,探讨数字化形式的相册给家庭记忆带来的改变。^[7]国内研究则始终把家庭相册看作研究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图像类史料,^[8]并不单独探讨相册对于家庭本身的意义。

尽管纸质家庭相册“沦为”了少数人的选择,但数字时代的到来与媒介研究思路的开拓都为家庭相册的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当相册的物质形式与人类的生存状态都被数字化浪潮所改变,纸质相册对于家庭的意义就更加耐人寻味。本文将在这两重变化的语境中展开讨论,提出研究问题如下:第一,数字时代,纸质相册对于家庭有何独特意义;第二,纸质相册如何改变家庭关系;第三,这种改变何以可能。

二、研究视角:ANT与媒介研究的对话

为了探究纸质相册与家庭、家庭成员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约翰·劳(John Law)等巴黎学派研究者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后文简称为ANT)作为分析框架。ANT最初的诞生是为了用新的社会学理论来适应科学和技术研究,如《实验室生活》(1979)、《科学在行动》(1987)、《法国的巴氏灭菌法》(1988)等经典著作,因此被认为是科学技术社会学(STS)的一个分支。但正如拉图尔所说,当非人类——微生物、扇贝、岩石和船只以一种新的方式向社会理论展示自己,他第一次发现科学和技术的对象变得具有社会兼容性,这使得该理论有了更丰富的发展方向。^[9]¹⁰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2005年,拉图尔在《重组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一书中系统阐释了ANT的理论目标,并提出了三条核心原则:赋予非人类超越传统自然因果关系的行动者角色;将“社会”视为研究的终点而不是用以解释其他事物状态的原因;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的重新联结而非分散或破坏。^[9]¹⁰拉图尔否认学界将“社会”视为稳定领域并以此来解释其他领域的做法,希望重新定义“社会”(social)并回到“社会学”(sociology)的最初使命:关于共同生活的科学(science of the living together)。^[9]¹²

ANT视角下,无论是人类还是物体、观念、技术等非人类(non-human),只要它在行动中制造差异并留下痕迹就可以被称为“行动者”(agency);任何行动者都不是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介者(intermediary)而是转译者(mediator),会在行动中转换(transform)、翻译(translate)、扭曲(distort)和修改(modify)它们本该携带的意义或元素,使其朝着多个方向发展,从而修改归因于其角色的所有矛盾性叙述。^[9]³⁹拉图尔用“转译”(translation)来概括这种不传递因果但可以使多个转译者同时存在的关系^[9]¹⁰⁸——只有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组合在一起,建立网络(network)。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网络并非互联网等实质性的网络,而是借鉴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块茎”(rhizome)概念,以开放性、无规则和非中心的多元化形态为主要特征^[10],是用来描述行动者痕迹的工具^[11]。因此,ANT实质上就是“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目的是通过追踪行动者留下的痕迹(trace)关注社会的重新联结(re-association)与重组(reassembling)何以可能,并进一步探究这种联结得以持续和不断扩展的原因^[10]⁷⁻¹¹。

站在媒介研究的立场上,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曾于2008年撰文论述ANT的理论贡献与局限性。他指出,有关媒介权力的分析一直受到媒体机构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复杂的双向互动性质的困扰,但ANT可以提供最精确的语言来阐述复杂的流动如何代表一种独特的权力形式——将媒体机构视为“必经之点”(an obligatory passing points),既能避免功能主义的分析倾向,又保持了对流向、经过和来自媒体机构的物质性的关注。但同时,ANT对于世界的认知过于扁平,对时间维度的关注度不够,对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解释力不足,致使其完全忽视了网络建立之后的动态变化及其对社会权力分配的长期后果,这限制了ANT在媒介研究和社会分析中的适用范围。^[12]在库尔德利之后,ANT与媒介研究的对话受到广泛关注。胡翼青认为,居间性是媒介的本质特征之一,媒介通过“居间”的方式将自己所联结的元素转化为媒介物,并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生成了某种向度的世界。^[13]特里斯坦·蒂尔曼认为,“转

译者”概念突出了媒介的“居间者”(being in-between)角色,从这个角度而言,“ANT 甚至没有考虑到‘非媒介’(non-media)的概念”^[14]。马尔库斯·斯博列尔回顾了 ANT 在媒介研究领域的应用,指出 ANT 揭示了一个流动的、不确定的媒介(media)或媒介化(mediatization)概念,打开了传统媒介研究中的“黑箱”^[15]。基于对欧陆媒介研究理论史的重新梳理,戴宇辰将二者之间的连通性概括为“媒介的社会形塑力量”^[16]。此后,传播学研究应用 ANT 视角多是为了呈现异质行动者的转译力量给网络带来的差异与偏移,并试图将不确定性与风险降到最低:如新闻生产创新中内容与技术的协作问题^[17]、国际传播中的媒介基础设施问题^[18]、短视频推荐算法的“黑箱”与运行逻辑^[19]、网络舆情的演化及治理逻辑^[20]、城市传播物质性维度的思考^[21]等。

受二者对话的启发,本研究不满足于将纸质相册视为家庭记忆载体的传统认知,也并不认同“恋旧的家庭才制作纸质相册”这样简单的因果逻辑,而是将纸质相册视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行动者,同时将家庭视为区别于仅在线上活跃(online liveness)的一种群体生活状态(group liveness),试图还原数字时代纸质相册在家庭内部真实的存在方式。这要求关注纸质相册本身做了什么,并拒绝把“家庭”当作先验性的存在,这与 ANT 的核心原则相契合。与此同时,媒介研究的理路还要求重点关注纸质相册在“居间”这一位阶上的媒介性,即纸质相册的行动力究竟从何而来。具体来看,拉图尔在《重组社会》中的一段论述为本文提供了分析思路:“要追随行动者自身”,通过追踪行动者无法被预设的创新性行为去理解集体因此发生的变化,了解他们为了推动集体形成精心使用了哪些方法,并找出能够定义他们迫于压力形成的新型联结的最佳解释^{[9]12}。基于此,本文将层层深入:首先论证纸质相册为何能被视作家庭中的行动者,即纸质相册如何改变家庭关系;其次,以纸质相册为中心点,绘制重要动线与行动者网络,并通过对话媒介研究,分析纸质相册缘何行动。

三、研究方法与说明

拉图尔在讨论 ANT 理论时认为:“为了描绘一个群体,无论它是从头开始创建还是简单地更新,都必须找到发言人(spokespersons)为群体的存在发声(speak for)”^{[9]31}。在本研究中,纸质相册的制作者是最合适的发言人:他们熟悉自身家庭的规则与先例,敏感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动和家庭关系发生的变化;他们能够定义家庭曾经是什么,并且希望定义未来的家庭应该是什么,同时在现实中采取了切实行动——通过制作纸质相册来推动家庭的改变。因此,制作者的“发言”可以为家庭关系在纸质相册诞生前后的阶段性变化提供最直接而生动的证据。以 ANT 为视角,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家庭内部的纸质相册进行考察,并尽力访谈制作者本人,努力还原行动的所有细节。2023 年 12 月到 2024 年 3 月,研究者通过在微信、豆瓣、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发布信息,招募到 20 位近三年内有过制作家庭相册经历的受访者。之所以限定三年,是希望排除已经弃用纸质相册的家庭,确保纸质相册是仍然活跃在家庭内部的“行动者”角色。访谈全部以语音形式进行,访谈时长均在 45 分钟到 1 小时之间,部分受访者有 1 位以上的家人共同参与访谈(在表中标注为“家人陪同”)。每次访谈开始时,研究者均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询问家庭成员如何看待家里的纸质相册,然后引导受访者对纸质相册的制作、使用、更新和维护过程进行详细叙述,并对新出现的行动者进行追问,完善行动细节。此外,研究者还对微博、豆瓣、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有关纸质家庭相册的笔记进行持续追踪和参与式观察,捕捉制作者的自我表述和体验,丰富研究细节。研究者本人曾从事过制作纸质家庭相册的实践,对不同行动者所使用的元语言较为熟悉,对研究过程中的反身性思考和学理性分析有一定帮助。

在 20 位受访者中,有四位受访者一直在更新家中的老相册,按照访谈顺序标记为 O1-O4;四位受访者在更新老相册的同时制作新相册,标记为 C5-C8;其他受访者则在近几年重新开始制作纸质相册,标记为 N9-N20。受访者的居住地较为广泛,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受访者的年龄区间位于 20 岁到 60 岁左右,其中 26 岁及以下的受访者有 11 人,均为未婚状态,其余受访者都已为人父母。本文对家庭结构

的划分参考了王跃生在《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的分类^[22],以受访者所认可的家庭成员为准,最终将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归为核心家庭,夫妇一方和子女组成的家庭归为单亲家庭;夫妇同一个已婚儿子及其孙子女归为直系家庭,父母和两个及以上已婚儿子及其孙子女组成的家庭归为复合家庭。受访者的具体信息见表 1。

四、研究发现

(一)纸质相册的行动者属性

拉图尔强调,考察一个实体是否在行动,我们必须提出两个问题:“它是否在与他者的联结关系中制造差异?”以及“我们是否能够辨别出它制造这些差异的痕迹?”^{[9]71}在数码相机普及之前,受限于摄影技术与经济条件,纸质相册通常由家中最具威望的长辈主持制作,其他家庭成员只是听从安排参与摄影或翻阅相册。这种情况下,纸质相册与家庭成员只存在“观看与被观看”的简单关系,是需要瞻仰的厚重“墓碑”,极少参与到家庭的日常互动之中,并未对家庭关系造成明显改变。但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摄影门槛降低,电子照片日渐普及,所有家庭成员都可以随时随地拍摄家庭照片,并把这些照片制作成纸质相册。纸质相册不再是由长辈保管的贵重物品,而是动态更新、随取随用的日常之“物”;它不仅寓意“过去”与“历史”,而且不断改写家庭的“当下”与“未来”。

1. 共同许诺:增设责任关系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创建并更新纸质相册意味着所有家庭成员共同许下了关于“家”的诺言:我们同属于这个家庭,我们对彼此负有责任,我们有义务让家庭变得更加美好。纸质相册给所有的家庭成员增设了一种责任关系:持续记录“家”的发展与变化。因此,更新纸质相册的过程就是家庭成员不断履行承诺的过程。

核心家庭往往会在夫妻二人缔结婚姻关系或者子女出生的特殊时刻创建一本新相册。空白相册意味新的制作起点与制作规范,也意味着新的责任关系。家庭成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当下的需要来记录家庭的成长与变化,自由度和可协调性较高。受访者 C6 与妻子刚刚结婚不久,正在为小家庭的独立做准备,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制作新的家庭相册,“目前打算把我们的结婚纪念照放进去,每个周年纪念日用相同的姿势拍照,用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不断变化的时间。”受访者 N12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从三四年前开始制作纸质相册,“我每年会把自己的、小朋友的和爱人的照片都挑选出来放进相册,因为家庭的成长和发展是悄无声息的,我希望能记录下来,也希望它(纸质相册)能成为我们家的一个传统。”

复合家庭的纸质相册往往继承自祖辈,里面收录了已经故去的家庭成员的历史影像。厚重的历史要求相册的继承者遵守旧相册的制作规范:继续添加新成员的家庭照片,以便完整表征“家人”的身份属性和伦理秩序,续写家庭故事。为了履行这种责任,相册的继承者会主动组织家庭活动,并收集各个小家最具代表性的家庭照片,用以更新纸质相册。

表 1 受访者信息表

受访者编号	年龄	性别	省份	家庭结构	备注
O1	26	女	上海	核心家庭	家人陪同
O2	19	男	河北	核心家庭	
O3	47	男	山西	核心家庭	
O4	35	男	北京	复合家庭	
C5	21	女	山东	核心家庭	
C6	29	男	福建	直系家庭	家人陪同
C7	30	女	山西	直系家庭	
C8	24	女	昆明	核心家庭	
N9	58	女	吉林	核心家庭	家人陪同
N10	22	男	山东	复合家庭	家人陪同
N11	23	男	四川	核心家庭	
N12	39	女	浙江	核心家庭	
N13	19	男	广西	核心家庭	
N14	26	女	河北	单亲家庭	
N15	29	女	天津	核心家庭	
N16	26	男	湖南	核心家庭	
N17	34	女	河北	核心家庭	
N18	20	女	广东	复合家庭	
N19	23	女	北京	核心家庭	
N20	30	女	浙江	核心家庭	

“我们家从今年开始重新组建家庭相册,是我父亲组织的,可能是年纪大了开始追忆岁月。他是爷爷奶奶最小的儿子,上面的哥哥姐姐也很疼他,都很支持,会把手里的照片都发给他。(相册)会以我爷爷奶奶为中心,把整个家族的照片都放进去。”(N10)

正是在家庭相册的制作和更新过程中,家庭成员坚持履行对于家和其他成员的责任,“家”的概念得以巩固和传播。

2. 具象显影:加强情感联结

有研究发现,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加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家庭成员在居住上的分离趋势导致了家庭关系的不断弱化,主观认同家庭的成员越来越少。^[23]但在拥有纸质相册的家庭中,成员对于“家”的主观认同感普遍较高,对于彼此的情感也更加深厚。纸质相册的存在加强了因时空分隔而薄弱的情感联结,并使情感基础更加坚实。

离家的游子定期把自己的生活照片冲洗出来装进家庭相册,就像把未曾共同经历的生活片段统统交给家庭来检阅和封装收藏,这种主动分享让情感跨越时空相互融通。受访者 O4 平常和父母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每次过年回家他都会冲洗 3-5 张较为重要的生活照片装进相册,“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时刻,比如在外出差学习、去景点旅游、与女朋友的合影等,好让父母知道我在成长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希望把我的情感同等程度地传达给父母”。

对于留在家中的长辈来说,不断更新的纸质相册代表着子女对他们的牵挂,不仅能帮助他们回忆与子女的相处瞬间,还能感受到来自子女爱的表达。受访者 N9 收到过女儿亲手制作的纸质相册,里面收录了女儿给她拍的旅游照片,她想女儿的时候就会翻翻相册。受访者 N18 的外婆有四个女儿,分散在五湖四海。

“她(女儿)知道我喜欢什么,总给我照,就让我选……我头回见这么好看的相册,外面是个纸壳,可硬朗了,手感可好了。”(N9)

“她们春节见面的时候就会一起去洗照片,一次可能洗二三十张,就放在外婆家,算是对外公外婆的一种陪伴。”(N18)

纸质相册把每个成员的生活经历都具象化。即便翻阅者没有亲身经历照片中的特定瞬间,同样可以根据影像展开联想,在脑海中生成关于某位家庭成员当时当地的性格特征和行为表现。这种具象显影帮助家庭成员消除了因时空分隔而产生的陌生感,也拉近了情感距离,加深了对彼此的认识。当家庭成员被巨大的地理距离隔开时,纸质相册指向了对情感关系的再次确认和主动维护。

3. 描摹图景:暗示行为规范

纸质相册收录的家庭照片是家庭成员共同挑选的结果,代表着过去最值得记忆的瞬间和未来最值得期待的相处模式。通过照片的主题分区、排列顺序以及数量、频率,纸质相册描摹出一幅关于家庭的理想图景,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家庭成员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

在一本纸质相册中,最显眼的位置通常是所有成员的合照,寓意家庭和睦、幸福美满;不同家庭成员的单人照片紧随其后,数量不必保持一致,但“要尽量做到公平一些”(N19)。合照与单人照片的相对位置彰显了“以家庭为先”的传统理念,单人照片的数量则代表着每位成员的家庭地位平等。有的纸质相册还会包含特殊的主题分区,比如母亲用心做的饭菜(C6)、家里养的花草(O1)或宠物(C7、N9),这同样属于理想家庭图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这种理想图景的呈现为家庭成员相处模式提供了行为规范:做有爱的一家人,尊重彼此,和睦相处。发生家庭矛盾时,纸质相册的存在会暗示家庭成员消解负面情绪,自我约束,努力缓和家庭关系。受访者 N15 表示,“有时候想吵架了,但突然看到纸质相册,就觉得算了”,N16 也曾巧妙借用纸质相册化解父母之间的矛盾:

“有一次我父母闹矛盾了,我就突发奇想拿着相册去找我妈聊天,跟她看以前的照片。感觉妈妈没那

么生气了,我就找话题让我爸爸也加入进来,他一开始还不太好意思,但是也过来了,后来我妹妹也加入了进来……说说话他们就慢慢不生气了。”(N16)

不过,纸质相册暗示的行为规范并不总是严肃而神圣,而是带有每个家庭独特的风格。部分家庭的纸质相册中收录了很多搞怪的照片或者带有虚拟美颜的 AI 照片,这些照片“不够端庄”“不够正经”,却获得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普遍认可,并作为一种对彼此的妥协和让步保留下来。

“看看儿子女儿小时候做得丑事、难看的发型,很有意思。他们长大后会把自己的丑照片藏起来,过段时间又找出来塞进相册里”。(O3)

“手机里的照相软件会有很多 AI 滤镜,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会玩,比如性转版,还有还原到 3 岁什么的,他们还会用贴纸给自己的照片进行加工,然后打印出来,他们会觉得很有意思。”(N19)

数字时代的纸质相册深度参与了家庭成员的日常互动。它的存在本身及其动态更新都在不停转译、重组并维系着家庭关系:不仅加固了旧有的情感联结,还增设了新的责任关系,通过描摹理想家庭图景暗示应有的行为规范。这些都使得家庭成员紧紧围绕在“家”的周围,关注家庭的发展,关心其他成员的成长与变化,并对未来抱有期待。这些都是纸质相册给家庭关系带来的积极改变,因此,纸质相册可被视为名副其实的行动者。

(二)纸质相册的行动力来源

拉图尔曾将物进入集群的历程区分为五个步骤:“转译”(translation)、“交叉”(crossover)、“征召”(enrollment)、“动员”(mobilization)和“置换”(displacement)^[24]。这五个步骤可以用来分析纸质相册如何进入家庭并改变家庭:最初,家庭把内部的观念认知和行为规范铭刻在纸质相册中,创建了家庭成员与纸质相册之间的初步联结;其次,家庭成员与纸质相册的各自属性产生交互,纸质相册被征召进入家庭这个集群,带来新的资源,并产生了“制作纸质相册的家庭成员”这样一个行动复合体;最后,整个家庭因纸质相册的引入转变了构成,形成了新的关系形态,也扩展了自身的界限。但纸质相册的行动力来源是什么?它给家庭关系制造的差异性改变何以可能?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重点解读交叉、征召与动员三个关键步骤,细致解释纸质相册为何会与家庭成员产生交互并产生新的行动复合体。

1. 打开黑箱:网络的“必经之点”

拉图尔曾在《巴斯德的实验室》一书中描述了实验室的建构过程以及实验室在整个社会环境中所处的位置。他指出,局外人对实验室实验的兴趣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巴斯德关于微生物学的研究征召(enroll)的结果。在法国十九世纪公共卫生运动的背景下,巴斯德把农民、兽医、学者、政府等不同群体对于卫生安全的需求转变为对于微生物实验的兴趣,由此将研发成果推广到了整个法国社会。正如卡隆所说,一个行动者为了建构一个事实,首先需要将不同的行动者的关注对象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从而使网络建构者的问题成为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必经之点。^[25]与巴斯德的实验室相类似,纸质相册在整个网络中也是一个必经之点。

提议制作纸质相册的家庭成员是整个网络的最初创建者,但他却无法控制所有行动,因为不断有新的异质行动者被征召进来。起初被征召的是电子设备。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指出,数字时代的特性就是“任何东西能够使用通用的二进制媒介进行编码、传输和存储”^[26]。照片冲印流程的全面数字化征召了不同类型的电子设备:制作者需要先后在手机、硬盘或网盘中挑选照片,利用无线网络、数据线、存储卡、U 盘或 APP 等传输照片,在线上或线下的冲印店挑选相纸尺寸和相册类型,才能实现从电子照片到纸质相册的顺利转换。如果选择“相册书”这种独特样式,制作者还需要 Photoshop 等软件对电子照片进行编辑和排版,然后再交付打印。在这个过程中,非人行动者的行动策略以阻碍和禁止为主,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制作相册需要付出很多时间与精力,不仅需要在海量的电子照片中进行挑选,还需要保证照片有足够清晰的像素。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提议制作纸质相册的家庭成员往往需要说服其他家庭成员提供帮助。尤其对于

中老年人而言,每个设备端口都有可能造成技术障碍,即便是划动手机屏幕挑选照片都有可能耗费全部精力。因此,了解并能熟练运用数字设备的家庭成员成为第二批被征召的行动者,他们在制作纸质相册时更加流畅,并且有着自己的审美偏好,例如受访者 O2 提到“他们(父母)会把照片发给我让我打印,可能觉得我更加擅长”。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成员的行动策略以鼓励和建议为主,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推进纸质相册的制作过程:

“我父母看到纸质照片会比较高兴,所以我就给家里买了一台打印机,帮他们连接好,然后教他们怎么用手机直接打印。他们有好看的照片就直接打印出来,有时候也帮我们打印。离得近的话,我们就用手机隔空投放;离得远就上传到网盘然后分享。”(N15)

此外,照片冲印店铺也是重要的行动者之一,它会影响到照片冲印的质量好坏、价格高低以及流程的繁琐程度。除了少数受访者在居住地附近能找到心仪的冲印店铺,大多数受访者都需要在电商平台中经历评估店铺质量和上传照片两个流程。尽管省去了现实空间里的身体移动,但如果程序过于复杂,照片冲印店也会对制作者的行动造成阻碍:

“看淘宝店铺怎么传输图片,我会选择方便上传的。有的要发邮箱,需要经过电脑打包发送,有的要通过 APP 或者小程序上传,我都试过,都很麻烦。我现在找到的这家店可以从手机页面直接上传,很方便,而且系统会提醒你照片清晰度不够高,如果没有别的备选照片我就会洗出来,有的话就会换掉。”(C8)

可以发现,提议制作纸质相册的家庭成员把这个活动“问题化”为所有相关行动者的需要——电子设备存储和传递信息,家庭成员帮助家人,照片冲印店获得经济利益。在从思想设计变为实在物的整个过程中,纸质相册与其他行动者发生了联结,各自的属性不断交叉。所有行动者的意图都经过转译并汇集在纸质相册中,并决定了纸质相册的最终形态。可以说,纸质相册本身就蕴含着复杂的行动关系。作为网络中的“必经之点”,纸质相册的最终形态是被“多元决定”的。

2. 有形实物:被铭刻的家庭关系

然而,上述分析无法解答更核心的问题:纸质相册作为行动者的独特性在哪里?是否任意一种物处于家庭关系网络的必经之点都能改变家庭关系?如果是虚拟状态的电子相册进入家庭,能否实现同样的效果?戴宇辰在解读行动者网络理论时认为,“物的能动性”在于能“制造差异”,这意味着人的意图性在遭遇物性过程中发生了“偏移”——正如拿枪的人变得不再是原初的人。这种解读符合拉图尔本人对“转译”的阐释,它们共同强调“人的意图发生偏移”这一行动的结果,却难免忽视了“物性”本身在行动中的能动作用。换言之,在“拿枪的人”这一案例中,拉图尔只需要枪支(物)的在场,却没有对枪支的型号、材质多加考虑,因此也没有进一步探究不同枪支在“制造差异”的过程中有何不同,但这恰恰同样属于“物的能动性”的重要来源。媒介研究对于“物质性”的关注刚好可以回答这一问题。只要把行动者视为“媒介”,“物性”的重要性就会凸显,从而能够考察“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27],这样更便于深入剖析行动者的力量来源。回到纸质相册,它的“物性”既在于纸张,还在于纸张的组织性。

首先,纸质相册以纸张为载体实现了电子数据的实体化。原本存储于电子照片和电子相册中的家庭记忆“只有在系统内部才能显现出来”^[28],但纸质相册却帮助家庭记忆突破“界面”,能够在现实空间中被看到和被触摸;同时电子照片过于庞杂,“动辄一两万张,找不到重点”(N20),精心选编的纸质相册反而因其数量的有限性避免了没有方向、没有秩序甚至没有意义的混沌的“危险”。^[29]因此,纸质相册的实体化不仅仅代表着对电子设备这一复杂中介物的取消,更意味着家庭成员的“回忆”行为得以从数字系统和虚拟空间中“回撤”。这种“取消”和“回撤”极大减弱了翻阅电子相册过程中人机交互身体图式带来的“排他性”^[30],使得不同家庭成员能够就同一个对象物进行近距离的交流和互动。正如受访者 N5 描述的那样,“家里人聚集到一起想看的时候很方便”。有的家庭会和家人一边聊天一边组装相册(N19),更多受访者家庭认为纸质相册是家庭内部打破沉默、开启聊天话题的重要媒介。

“感觉(相册)在我们家还是挺重要的,家庭关系更加融洽了,有了更多的交流,家庭幸福感提升很多。”(N13)

“(之前)大家都抱着手机刷抖音什么的,都不无聊。但是他们看我整理照片都会围过来,会吸引他们,都会放下手机过来进行交流,很增进感情。有的时候看着照片就会聊,‘原来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吃了这个,好吃,下次再去’,瞬间就回到了上次的情境。”(N15)

其次,纸质相册中的照片有着明确的组织框架,其或是线性的时间顺序,或是高潮时刻的周期性重复,这种“有组织性”有效铭刻了制作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行动关系。只要明确相册的组织框架,任何一张家庭照片都可以通过它所在的相册及前后页的照片内容迅速定位,“只要我想到哪张,基本上瞬间都能找到它在哪本相册的哪个位置”(N20)。与此同时,是谁提供了这张照片、他/她与照片的主人公是何种关系、又是谁收录了这张照片、为什么会把这张照片放在这个位置……与照片有关的所有行动关系都随之浮现。可以说,照片本身及其在相册中的特定位置镌刻并表征了家庭关系,塑造了一种媒介化的代际团结。以受访者 N9 收到的相册为例,相册封面的花色和软硬、相册内页的厚薄与手感、照片中人物的神态与动作、相册的排版与设计、塑封与否……这些细节和元素都是女儿在询问她意见之后做出的选择,因此她在聊到相册时想到的不仅是拍摄场景,更是女儿与她的交流、互动,以及流动在彼此之间的满满的爱意:

“有一本旅游相册,是我姑娘花钱给做的……让我选照片,有的是花钱照的,有的是拿我手机照的,选好后转给女儿,女儿找了个做相册的做好了……封面和每张照片上都有字,是姑娘自己编的……头一回见这么好的相册,都不会坏”。(N9)

作为行动者,纸质相册的特殊性在于它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实体化过程,将家庭记忆从电子数据转化为可触摸的纸质照片,并且以组织框架铭刻了所有与之相关的行动关系。当有形的物质形态和网络中“居间”位阶实现有机结合,纸质相册可以引导家庭成员在空间维度上不断拉近身体与情感的距离,并将制作过程中重组的家庭关系固定下来,持续提醒家庭成员维系家庭关系。可以说,同样作为网络中的“居间者”,纸质相册以有形的物质形态在家庭成员之间制造了更广泛而深刻的联结,从而具备更强的行动力。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 ANT 为分析视角,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数字时代纸质相册的存在原因及其对于家庭的特殊意义。研究认为,需要重新理解当下的纸质相册,它不再是传统认知中需要瞻仰、静置不动的家庭历史记录册,而是重组家庭关系、维系家庭情感的重要行动者。

首先回应了“纸质相册如何行动”这一问题。通过家庭成员的共同许诺,纸质相册增设了关于“家”的责任关系;通过对记忆的具象显影,纸质相册不断强化家庭成员因时空分隔而薄弱的情感联结;通过描摹理想家庭图景,纸质相册暗示了家庭成员需要遵循的行为规范。正是在纸质相册的行动中,家庭关系被不断转译,并趋向于更加幸福的家庭关系。

其次回应“纸质相册的行动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纸质相册的制作过程不仅征召了多种电子设备和照片冲印店铺,还征召了熟悉数字技术逻辑的家庭成员完成分工合作。这些新的行动者会实施阻碍、禁止、鼓励、建议等不同的转译策略,所有行动者的意图最终都汇集到纸质相册这个“必经之点”,决定了纸质相册的最终形态。纸质相册是所有行动者共同作用的产物,一经诞生就成为家庭关系网络中新的行动者。在从思想设计变为实在物体的过程中,“电子照片纸质化”和“纸质照片相册化”两个环节赋予了纸质相册以物质形态,并借此铭刻了所有行动关系。有形的物质形态与“居间”这一位阶的结合共同赋予了纸质相册行动力量。这种从无到有的特殊性使得纸质相册成为转译、重组与维系家庭关系的特殊行动者。

将纸质相册视为行动者,有助于深入当代家庭内部,形成对家庭关系网络的动态理解;对纸质相册作

为“居间者”的媒介性进行重点关注,则可以发现纸质相册的行动力量来源何处。在本研究的整个网络中,纸质相册的物质形态具有独特作用,当它与“居间”这个位阶相结合,就能够与家庭关系“相互生成,互为媒介”^[31],这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研究的对话提供了新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大胆提出设想:相较于数字形式,具备物质形态的媒介物在维系初级社会群体关系方面是更有力的行动者。因为初级社会群体与其他群体不同,情感联结更为紧密,且不涉及政治或商业利益,但这一设想还需要更多的经验案例加以验证。

参考文献:

- [1] 杨莉莉.从“摄影中心化”到“社交网络中心化”——中西个人摄影史比较研究[C]//中央美术学院2012年青年艺术批评获奖论文集.深圳: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13:14.
- [2] BOURDIEU P.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M]. Lond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 苏珊·桑塔格.论摄影[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4] SPENCE J, HOLLAND P. Family snaps: The meaning of domestic photography[M]. London: Virago Press, 1991: 3.
- [5] HIRSCH M. Family frames: Photography, narrative, and post-memo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
- [6] ZUROMSKIS C. Snapshot photography: The lives of image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3: 6.
- [7] HOLLOWAY D, GREEN L. Mediated memory making: The virtual family photograph album[J]. Communications, 2017 (3): 351-368.
- [8] 孙信茹,杨星星.家庭照片:作为文化建构的记忆——大等喊傣族村寨的媒介人类学解读[J].新闻大学,2012(3):42-51.
- [9]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0] 郭明哲.行动者网络理论(ANT)[D].上海:复旦大学,2008.
- [11] 吴莹,卢雨露,陈家建,等.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8 (2):218-234.
- [12] COULDRY 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edia: Do they connect and on what terms? [M]//HEPP A, KROTZ F, MOORES S, et al. Connectivity, networks and flows: Conceptualizing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2008: 93-110.
- [13] 胡翼青,郭静.反思媒介视角下的传播理论[N/OL].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2-29].https://www.cssn.cn/xwcbx/202212/t20221229_5575484.shtml.
- [14] THIELMANN T. Digitale rechenchaft. Die netzwerkbedingungen der akteur-medien-theorie seit amtieren des computers [M]//THEILMANN T, SCHUTTPELZ E. Akteur-medien-theorie.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3: 377-424.
- [15] SPÖHRER M, OCHSNER B. Applying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in media studies[M]. Hershey: IGI Global, 2017: 1-19.
- [16] 戴宇辰.“旧相识”和“新重逢”: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9 (4):68-88.
- [17] 肖鲸桐,方洁.内容与技术如何协作?——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新闻生产创新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11): 99-118.
- [18] 陆国亮.国际传播的媒介基础设施:行动者网络理论视阈下的海底电缆[J].新闻记者,2022(9):55-69.
- [19] 温凤鸣,解学芳.短视频推荐算法的运行逻辑与伦理隐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160-169.
- [20] 李翠敏,徐生权.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网络舆情的演化及治理研究[J].情报杂志,2022(2):134-139+197.
- [21] 戴宇辰.“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理解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3):54-67+127.
- [22] 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1):96-108+207.
- [23] 张丽萍,王广州.中国家庭结构变化及存在问题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22(2):17-32+242.

- [24] 戴宇辰. “物”缘何行动? ——拉图尔的“物之社会学”考察[J]. 社会学评论, 2023(2):191-211.
- [25] 郭俊立. 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哲学意蕴评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2):104-108.
- [26]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胡菊兰. 走向媒介本体论[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4):249-254.
- [27] 章戈浩, 张磊. 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 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J]. 全球传媒学刊, 2019(2):103-115.
- [28] 陈羽峰, 胡翼青.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数字化转型[J]. 中国出版, 2022(23):27-33.
- [29] 姜宇辉. 数字“海洋”中的“崇高”与“创伤”——重思数字美学的三个关键词[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10):127-136.
- [30] 景义新, 沈静. 屏幕媒介的变迁: 渊源、衍变与未来——移动智媒时代“从屏幕到界面”的思考[J]. 当代传播, 2017(6): 26-28+46.
- [31] 胡翼青, 谌知翼. 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 作为世界的媒介[J]. 新闻记者, 2022(10):3-15.

Translating, Reassembling and Maintaining: Paper Photo Albums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from an ANT Perspective

LIU Yixuan, HU Yiq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tor-Network-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0 familie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paper photo albums. The study finds that paper photo albums, which could be called actors, translate the family relationships by adding a responsibility relationship for the whole family through the common promise of family members, strengthening the affection connection between different members through figuring the memories, and setting behavioral norms for each member by depicting the ideal family. In the process of action, paper photo albums enroll many heterogeneous actors and become the obligatory passing points, then engrave the action relationship on paper material, which ultimately drives the paper photo albums' action, making the reassembling and maintaining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possible.

Key words: paper family albums; ANT; actor; translation; family relationships

(责任编辑: 傅 游)